

景德镇墨彩瓷艺术的传承创新

谢俊仪

陶瓷艺术之所以为人瞩目，不仅仅是科学理性的精心设计和巧夺天工的艺术创造，更是人类情感的表达，是将人类智慧和人文精神赋予陶瓷这一物质形态，抒发精神的个性，它的传承和发展至今仍以清新隽永的姿态和浓厚淳朴的韵味装点着我们的生活，墨彩艺术即如此。

墨彩，因其在陶瓷美术技法中产生一定影响，因而成为一种彩绘装饰工艺门类。它是从粉彩技法中衍生出来的一种陶瓷装饰绘画形式，是以黑色颜料为主在瓷器表面来表现物象，根据不同题材，运用描、皴、擦、点、染等方式，使画面呈现浓淡不一的层次，以及水墨效果的陶瓷装饰绘画。墨彩的“彩”，如同粉彩之填色，也是一种绘画手法。其彩绘技法表现因绘画装饰的内容不同，表现材质材料的不一而变化万千，俗称“彩水墨”。张九铨在《南窑笔记》彩色中说：“可供洗染、点缀之妙，又有水墨一种尤为逸品也。”《景德镇陶瓷史稿》记载墨彩为“水墨一种，一般称它为墨彩。”

景德镇陶瓷除釉下、釉中装饰之外，釉上装饰方法从元代开始有很多，墨彩装饰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其中所占有的地位却不容忽视。《南窑笔记》中称墨彩为“逸品”，是指中国传统水墨画中的“能品、妙品、神品、逸品”四个标准，其中逸品是传统绘画的最高境界。

墨彩瓷画有着明晰的发展和演变历史及其艺术特点与风格。墨彩瓷艺发展到今天，其中有传统工艺，也有近现代和当代工艺，从现存清代康熙至民国时期的墨彩作品分析，墨彩经历了萌芽时期：墨彩萌芽于清康熙年间，墨彩瓷艺与单纯黑彩瓷艺相比较，艺术特征的表现有了很大改变。发展时期：清雍正时期创烧的“珐琅彩”开启了墨彩发展的新阶段，人物题材画面增多，并以矾红点缀，使人物表情更加丰富。高峰时期：清乾隆时期，当时御窑厂新配制的一种黑料“新制彩水墨”，用珐琅彩工艺绘制，以督陶官唐英为代表，以诗句和书法丰富了墨彩的形式，用笔细腻精致、色调浓淡多变、形象准确生动，达到诗、书、画、印交融一体的意境，拓展了墨彩瓷画的艺术语境，提升了墨彩的艺术品位，使景德镇墨彩瓷艺达到高峰阶段。没落时期：清乾隆以后，景德镇墨彩瓷艺随着景德镇瓷业的逐渐沉寂而没落，鲜见墨彩作品传世。复苏时期：清末民国时，传统黑料逐渐被进口洋料所代替，出现用洋料绘制的“墨彩雪景”“墨彩人像”及轮廓描金的“墨彩描金”等品种。之后又逐渐恢复采用自配颜料。传承创新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墨彩瓷画技艺得到传承，新的时代风格也逐渐形成，装饰的器型和题材呈现多样化。改革开放后，墨彩工艺在传承的基础上材质、技法、色彩、题材以及内涵都有了较大的提升，运用粉彩与墨彩结合的被称为“粉墨彩”的瓷画表现形式得到运用和推广。



清光绪墨彩芦雁纹花盆



清乾隆墨彩描金壁挂瓶



清雍正墨彩人物盘口瓶

墨彩瓷工艺用料虽然较为单一，但工序较为复杂，一是墨彩工艺既有人为的描、皴、擦、点、染，又有以自然晕散与流动表现自然界变化莫测的物象和意境，把中国版画、西洋铜版画、水彩画、油画等加以融会运用，所采用的画法既有工笔又有写意，精微处丝丝入扣，豪放处生动活泼，画面对比“疏能走马，密不容针”。二是色彩浓淡多变，其艳黑不是简单的厚重浓艳，而是浓淡相间，如康熙青花瓷一样，达到“料分五色”的效果，避免了浓墨重彩而给人带来的压迫感。三是具有较强的综合装饰性，墨彩经过陶瓷创作者长期的研究和设计，逐渐形成独特的风格，有自己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在绘画技法上汲取三彩、五彩、珐琅彩、粉彩等其他陶瓷绘画艺术营养，由单一的黑料点染到加入矾红洗染与套色和描金等手法，使所要描绘的对象，无论是山水、人物、花草，还是鸟虫都显得质感冰玉玉衡，层次清晰分明，色彩明快雅致。

在新时代的墨彩创新实践中，仍然从根本上离不开瓷画艺术千百年来所蕴含的艺术营养。因为对传统营养的汲取可以敏锐我们的视觉，墨彩瓷画艺术的有效传承对于后来者进行墨彩艺术的有效创新具有直接的作用力。没有传承的创新和没有创新的传承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传承，是对传统墨彩瓷画进行保留和继承，在墨彩瓷画生命发展过程中起着延续保持的作用，创新是一种遵循艺术发展规律的行为，在探索当代墨彩瓷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的同时，重新认识它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在现实中的意义，并进一步优化、充实墨彩画内在的审美形式，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实现形象把握与理性把握的统一。当代墨彩瓷画工艺在“与生活同行，与时代同步”的特定环境中，艺术家们本着自身理想化需要，为满足社会的艺术需求，以现代的思维模式探索创新有别于传统墨彩的技法思路和见解为导向，利用现代理念和科技，在墨彩工艺所反映的事物、使用的方法、融合的元素、前行的路径上获得了一定成效。

墨彩瓷艺术是在古老文明环境中产生的一朵艺术奇葩，在其发展历史中传承创新一直在这一艺术领域萦绕。如清代唐英的“新制彩水墨”，民国时期的周湘甫将古法墨彩描金技艺与现代粉彩工艺巧妙结合，独创的新墨彩描金技艺。当代的李文跃凭着从艺几十年扎实的传统绘画艺术功底和创作理念与探索，将粉彩瓷的润雅和美与墨彩瓷的清丽雅致之意韵融为一体，创立了颇具个性的“粉墨彩瓷”装饰风格。

墨彩瓷是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工艺技术的独特艺术形式，其细腻的绘画技巧和浓郁的墨色韵味使得它成为瓷器艺术中的瑰宝，极大地美化了我们的生活，提升了人们的艺术品格。

(文中器物藏于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罕见的巾箱本《杨升庵辑要三种》说略

朱晋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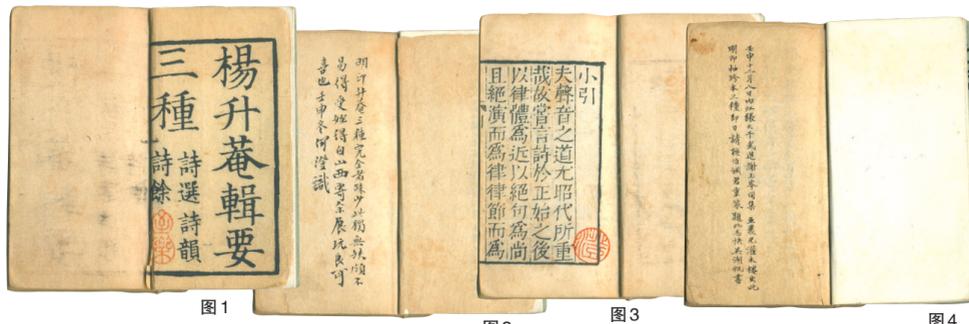


图1

图2

图3

图4

在古籍的各种版本中，有一种版式小巧的图书被称为“巾箱本”。其名称由来之一，这类书小到可装在古人装头巾用的小箱子里，故称“巾箱本”。又因版式小而可藏于袖中，便于携带，因此也称作“袖珍本”。

苏州博物馆收藏众多古籍之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之一就是明代刊刻的巾箱本古籍《杨升庵辑要三种》(图1)。此书很迷你，长5.2厘米，宽3.2厘米，尺寸刚好适合放在读者的掌心。相较于其他存世的大多数巾箱本古籍，《杨升庵辑要三种》尺寸更小。书的主要内容是明代杨慎编选的“诗选”“诗韵”“诗余”，可以作为喜好诗词文人的口袋书。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代状元、文学家、诗人，传世文集《升庵集》。杨升庵父亲乃是历史名宗，孝宗、武宗、世宗的四朝元老杨廷和，位极人臣，权重一时。杨升庵作为顶级“官二代”成为状元，人称“明朝第一才子”。

杨升庵最著名的诗词当属《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了解中国文化和古代诗词的人，大都读过这首《临江仙》。杨升庵因为在“大礼议”事件中坚持儒家法礼制，被发配到云南。从此，除了父亲杨廷和去世回到四川参加葬礼以外，杨慎余生的三十多年几乎都在云南。在云南时，内心饱受煎熬的杨升庵凭借历代先贤的诗词排遣心中郁结，并创作出“诗选”“诗韵”“诗余”。正因为杨升庵的人生落差之大，才写出“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般浑厚、超然的诗句。

《杨升庵辑要三种》自明代问世后几经流转，在民国时期，为阿亚农所得，并由其后人捐赠给苏州博物馆。

阿亚农(1880—1946)，名何澄，字亚农，先号“两渡村人”，后号“灌木楼主人”，山西灵石人，国民党元老、实业家、收藏家。他的女儿是有着“中国居里夫人”美称的何泽慧，女婿是“两弹一星元勋”、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

何氏家族祖上出了多位进士，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名门望族。青年时代，阿亚农赴日本留学，就读东亚商业学校、东京振武学堂、陆军士官学校等学校。之后，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资历最老的同盟会员之一，被称其为“国民党元老”。从日本回到中国后，阿亚农赴河北保定，在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担任教官。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全国风起云涌的革命洪流中，阿亚农和于右任等人一起随佐陈其美潜逃上海，被任为沪军第二十三师参谋长，一时位高权重。

然而，在民国初年，阿亚农萌生退出政界之意。“两渡村人”遂卸去官职，闲居在妻子王季璠家族所在的苏州，营造赫

赫有名的灌木楼，成为“灌木楼主人”。阿亚农的第一个号来自家乡——山西灵石两渡村，第二个号便是来自移居苏州后的住所灌木楼。如今，灌木楼大隐隐于市，坐落在苏州古城十全街的南园宾馆内。阿亚农在苏州期间，经办实业、经营学校，尤为突出的是管理岳母王谢长达创办振华女校，成为该校的校董。

阿亚农博学多闻，精于鉴赏，常常收购古玩。1940年，阿亚农从北洋军阀将领张锡奎之子张师黄手中购得苏州网师园，费时三年修整亭台轩榭，增补花木，特意将古玩字画藏于园内。《杨升庵辑要三种》是阿亚农在苏州期间所获的珍宝，并在正文的前页写下：“明印升庵三种，完全者殊少，此独无缺，颇不易得，受任得自山西，寄余展玩，良可喜也。壬申冬，何澄识。”(图2)这段题记的大致意思是：明代刻印的这部杨升庵的书，完整的非常少，这部独独完整，颇为不易，何亚农的侄子从山西寄给他展玩，他极其高兴。壬申年(1932)的冬天，何亚农得到此书，遂写下题记。为表达自己对此书的钟爱之情，阿亚农在书的“小引”页盖上了自己的印章“澄”，(图3)表示何澄收藏过。

近现代杰出的书画大家、收藏家和鉴赏家吴湖帆在阿亚农题记的前页写下“壬申十二月八日，内江张大千、武进谢玉岑同集亚农灌木楼，出此明印袖珍本三种，即日请孙伯渊重装，题此志快，吴湖帆书。”(图4)壬申年(1932)的十二月八日，阿亚农、张大千、谢玉岑和吴湖帆在灌木楼相会，鉴赏古籍《杨升庵辑要三种》，并请苏州装裱世家孙伯渊重新装裱。吴湖帆内心愉快地写下这段文字。

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中国近现代画家，与其兄张善孖因与张锡奎之子张师黄交厚，遂住在苏州网师园，并养一只老虎。网师园和灌木楼近在咫尺，张大千与阿亚农两位同道中人自然熟稔，交游甚多。

谢玉岑(1899—1935)，江苏武进人，民国词人兼书画家，是书法家、书画鉴定专家谢稚柳的兄长。谢玉岑是张大千的密友，当年海上艺坛有“玉岑诗，大千画”之美誉。

孙伯渊(1898—1984)，江苏苏州人，装裱名家，著名收藏家、鉴赏家。他在护龙街(今人民路)的作坊“集宝斋”逐渐成了苏沪一带书画家、收藏家聚集之地，而孙伯渊也在和他们的交往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鉴赏和收藏能力。其交友的收藏名家或书画家有庞莱臣、顾麟士、陆廉夫、吴湖帆、冯超然、张大千、张善孖、谢玉岑等众多名人。

20世纪30年代，阿亚农、张大千、谢玉岑和吴湖帆作为挚友兼知音，在灌木楼一起品鉴凤毛麟角的袖珍古籍，一起追思才子杨升庵的跌宕人生，“志快”之心，自然不期而至。灌木楼恰是一幢精致的“小楼”，借用鲁迅词句，阿亚农等人享受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宁静和惬意。这套稀世罕见的巾箱本，因为汇集了多位名人的收藏和交往故事，使之弥足珍贵。

因为中国马球，就在那里

《中国马球》填补中国马球研究历史空白

付裕

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王婧婵、王国华、栾奕合著的《中国马球》，收录近500幅中国古代马球文物高清图片和现代马球照片，以超过10万字的规模系统梳理了中国的马球运动和球文化的发展史，是一本图文并茂展示和讲述中国古代马球辉煌历史和近现代马球发展历程的经典专著，填补了中国马球研究的历史空白。

填补中国马球研究的历史空白

“第一次见到章怀太子墓马球壁画图片时，我们三个人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历史和现实，古代与未来，因为中国马球，在这一时刻，紧紧地拥抱和交汇在一起，鼓励着我们一家三口，坚定着我们的决心。”《中国马球》作者王国华在回忆写作过程时，不免动容。

在马球文物中，文化和艺术价值最高、最能完整地将打马球的场景保留且展示给后人的，是唐代和辽金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马球壁画，最著名的是唐章怀太子墓西壁的马球壁画。这幅展现打马球盛大场景的壁画，原长20余米，只揭取下5片保存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这些壁画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在查阅并反复研究考古发掘报告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决定聘请专业画师临摹章怀太子墓马球壁画等壁画，以便为读者展示古代打马球的壮观场景。”王国华表示，临摹只是撰写《中国马球》时的繁重琐碎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以中国马球为线索，包括遍寻海内外重要文物、追寻相关遗址遗迹、采访相关人物后人等，也是三位作者的重要工作之一。

与文博机构接洽，往返法国、英国、美国等海外博物馆查阅资料，取得相关授权，需要更加艰辛的努力。他们既要弄清哪些博物馆和图书馆收藏中国马球文物，又要鼓起勇气写信申请，如为得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北魏曹望德造像石刻图片授权，王婧婵历时一年，三次与校方沟通协调。尽管过程烦琐，还需支付相应费用，但每得到一幅高清图片，一家人都如获至宝。

成书于明隆庆六年(1572)，由时任内阁首辅张居正编纂的《帝鉴图说》版本甚多，《中国马球》收录了四个版本：故宫博物院藏内府珍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馆藏明万历年潘



北宋 明皇击球图卷 纸本水墨 纵32.1厘米，横523.2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中国马球》收录的第一届全运会马球比赛照片，内蒙古队25:0战胜青海队

允端刊蝴蝶装本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嘉庆年间纯忠堂刻本，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彩绘版是通过郭红卫及其学生获得的授权。这样，来源精准、资料翔实、印刷精美、四幅珍贵的文物高清图片再现了唐敬宗在父亲唐穆宗因击球暴疾而亡后，不事反思、沉迷于打马球等游戏，最终被谋杀丧命的故事。王国华认为，“流传千年的中国马球故事，无论对马球手、马球爱好者，还是马球研究者都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可以说，《中国马球》的“古代篇”以中国马球文物重新整理为出发点，通过艰难追寻，最大可能聚集海内外知名博物馆的马球文物，以时代为顺序，将古代马球相关陶俑、壁画、砖雕、铜镜、石刻、书画等重点文物图片收集起来，将散落海内外历史文献中的资料、记录挖掘出来，向世人呈现完整、丰富的中国古代马球历史。

为马球研究提供更好的素材

《中国马球》第一作者王婧婵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香港大学，

曾在联合国妇女署实习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特别研究助理。王婧婵是位优秀的女子马球手，小时候在父亲王国华、母亲栾奕的鼓励下学习马球运动，多次参加国际马球赛事。王国华毕业于天津大学，是马球历史和文化的爱好者、收集者、推广者；栾奕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维克森林大学，曾作为中国第一位女子马球解说员，主持解说过重要马球赛事，多次获得“最佳解说员”称号。2021年9月，王婧婵与栾奕出版了一本中英双语《马球规则手册》。

马球，是一项古老而充满激情的运动。现代马球运动被誉为“王者的运动”和“运动中的王者”，是三大马上体育运动(马球、马术和赛马)之一。2019年11月，王婧婵和球友到阿根廷观看马球公开赛中级球手之间的对决(40级对40级)。途中，她恰巧买到一本《Passion & Glory: A Century Of Argentine Polo》，这本图录展现了一个世纪以来阿根廷辉煌并富有激情的马球历史。回家以后，王婧婵和父母一起翻看这本图录。对于马球极其热爱且富有学识的一家三口，立刻想到“能否也出版一本展现中国古代马球辉煌历史和现代马球发展历程的书籍?”敢想敢拼，说做就做。他们就这样勇敢且愉快地开启了《中国马球》的筹划和编写工作。

“虽然遇到诸多困难，但马球运动带来的激情和荣耀激励着我们把这项工作做下去，由最初出版一本书的冲动，逐步升华为一种情怀、一种责任和一种使命。”王婧婵表示，从冲动感到使命感的升华，使我们更有信心和勇气化解和克服遇到的困惑和难题，更敢于直面挑战，持续不断地投入超常的精力和财力，坚持做完这本小图书。

与此同时，也是因为使命感，一家人的梦想升级。从最初的构想出版一本中国马球画册，变成了出版一本既有一定学术价值又有美学价值的讲述马球历史的图录。

《中国马球》是王婧婵、王国华和栾奕一家，以对马球的非凡热爱为基础，经过艰苦努力进行学术与艺术研究的结晶。

梦想照进现实

《中国马球》的“近现代篇”通过300多幅珍贵照片及文物，将现代马球传入中国的历史以及现代马球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一一呈现。作者通过深入检索和查询，收集整理海内外相关数据库中的珍贵资料和图片，找到清末民国时期现代马球传入中国的珍贵史料，查找到中国人马球手和马球队及各种马球赛事奖杯等文物。1932年，上海出现了第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马球队。1932年8月至9月，在《大陆报》和《上海星期时报》上分别刊登了队员的英文名：William Hu, L.P. Wong Quincey, T.Y. Tung and Z.L. Koo。但对于他们的中文名和个人背景，报纸上却没有介绍。王国华介绍，通过检索民国时期的报刊，反复查阅中英文资料，最终确定了他们的中文名：胡惠林、王昆山、童振远和顾兆麟。他们在上海江湾跑马场的马球队组成了中国人的马球队。

作为一本图文并茂讲述中国马球历史的大型图书，作者竭尽全力地追求文物史料的真实准确。“我们对中国近现代马球的发源地上海、北京、天津和呼和浩特进行了实地走访和调研。尽管岁月流逝，物是人非，但每到一处曾经的马球场和相关建筑，我们都能联想到当年马球赛场上球手们风驰电掣的英姿，感受到球员打马球的激情，记录马球历程也就成了我们的一种情怀。”王婧婵表示，在呼和浩特，走访和联系了数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马球名家及其后人，得到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感受到了历史和现实的非凡力量。

“《中国马球》是我们一家辛苦努力的结晶，是梦想照进现实。”栾奕说，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投入那么多，费那么大精力，是为了什么?这使他们想起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的一句激励无数登山爱好者的名言：“当年记者提问：‘你为什么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他的回答是：‘因为山在那里。’虽然我们并没有乔治·马洛里那样的英雄气概，但仍想在这里借他的名言，解释我们坚持不懈完成本书的初衷——因为中国马球，就在那里。”王婧婵说。